

歷史研究的偶然與延宕

姚人多

每次要「告白」的時候我就不停想起傅柯在 *The History of Sexuality* 所說的「自白」，對任何研究者來說，這都是一個恐怖時刻。研究的價值與定位需要別的研究者來確認，我自覺到，從自己嘴巴裡說出來的定位，往往是一種事後的自圓其說，與寫作當時的起心動念總是有著不小的差距。

唯一值得提的一點是論文生產過程的「延宕」。事實上，文章中的統計數據已經擺在我電腦裡面有四年之久，不過，我一直不知道這些數字的確切意義。直到去年有一天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，我需要去國家圖書館查閱《臺灣黨務》這份國民黨改造期間所留下來的刊物。我記得我跟助理從架子上把所有的《臺灣黨務》從架子上拿下來影印。看來看去，我突然懂了一些事情。我後來才知道，我懂的那些事情也許就是當時整個歷史的演變過程。在很短的時間內，我完成了這篇論文。我花的時間不長，因為那些東西一直在我腦袋裡，直到一個偶然的線索跑進來，像是找到了最後幾片重要的拼圖一樣。

這篇文章的生產過程跟我論文中所描述的歷史過程很類似，都曾經歷了一些偶然與延宕。有些東西，尤其是統治技藝與政治理性，很難隨著時間流轉或是政權轉移而煙消雲散。保甲制度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對新來乍到的統治者來說，最好的方法便是沿用過去的制度，這是降低統治成本最好的方法。然而，我發現，國民黨政權並沒有這樣做。它沒有這樣做不是因為它比日本人更仁慈或更民主，而是因為當時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上的落差。在政治理性上，它刻意強調與日本殖民政權不同，所以，像保甲制度這樣一個深深帶著殖民烙印的統治技藝，自然而然被它鄙視。就算國民黨要用，也必須偷偷摸摸、暗渡陳倉，或者喬裝打扮、掩人耳目。就這樣模模糊糊過了幾年之後，國民黨政權慢慢發現，事情很不對勁。作為一個外來政權，它所面對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土地與人民，它迫切需要一些機制來知道與控制底層的人民。特別是國民黨政權是一個開放地方選舉的外來政權，它不只需要「反攻大陸」，它還需要贏得選舉。這就開啟了保甲制度轉化的因子。從當時國民黨人所留下的大量文字中，我們可以清楚指認

出這個政權的思考過程。

做歷史研究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航行，一開始，是處於一種震撼，海這麼大，我要去哪裡。然後，如果夠幸運的話，會開始找到一些線索與方向。往前航行的過程中，會看到一些小島，這些陸地會讓人以為終於抵達終點了。不過，上了岸卻發現島上什麼也沒有，那裡根本不是一開始要去的目的地。對我來說，歷史研究中總是帶著點偶然的因素，像是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，或是偶然聽到一場演講。換句話說，有時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「延宕」多久才會靠岸。如何在升等的「必然」壓力下盡快找出「偶然」的靈感與線索，這也許是每一個做歷史研究的助理教授們所必須思索的問題吧。